

试析冷战后台湾对欧盟的“外交”

孙 云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冷战后, 随着欧盟政经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各个时期, 台湾当局都非常重视对欧盟的“外交”, 将欧盟视为继美、日之后的“重点工作对象”, 采取多种形式, 不断推动台湾与欧盟实质关系的发展。从欧盟来看, 基于经贸利益的诱因及对台湾民主化的认同, 在“政经分离”的外交政策下, 也有意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本文试图勾勒冷战后台湾当局对欧盟“外交”的基本轨迹, 探讨台当局对欧“外交”的主要形式, 并分析推动台湾与欧盟关系发展的因素及制约。

关键词: 台湾与欧盟关系; 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2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1)03-0006-07

一、冷战后台湾当局对欧盟“外交”的强化

台湾与欧盟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际政治基本上是由美苏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所主导。这期间, 台湾在“外交”上一直把对美关系放在第一位, 并扮演美国“忠实盟邦”的角色, 获得美国的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而当时的西欧正处于战后挣扎中, 地理位置遥远, 加上西欧并没有像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 因此台湾当局的“外交”日程中不太看重欧洲。由于采取“重美轻欧”的基本政策, 对诞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台湾当局也没有给以很大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 欧洲经济整合已初展成效, 而大陆由于发生“文革”, 正常的外交关系受到冲击。台湾当局试图利用此机会, 积极拓展与欧盟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 台湾与欧盟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 如1969年争取奥地利给予台湾“优惠关税待遇”, 在西班牙、奥地利设立“孙中山研究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等机构。不过, 由于缺乏“外交”关系及欧共体权责仅局限于贸易方面, 台湾与欧共体的关系也主要着重于经济而非政治。而且, 这时台湾的经济发展仍相当困难, 并且依赖美国的援助, 台湾与欧共体的双边贸易额微不足道。双边贸易额在1958年及1970年分别占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研究”(2009JJD810014)

作者简介: 孙 云, 男,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国家“985工程”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

欧盟对外贸易的 0.05% 和 0.23%。^[1]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降低,台湾不仅被驱逐出联合国,而且中美、中日关系改善,西欧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欧共体也于 1975 年同中国建交,台湾与欧盟的关系进入空前的艰困期。不过,这也促使台湾的“外交”发生两个转变:第一,开始审视过去仅仅重视对美关系的局限。台湾当局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扩大与欧共体的交往,不能将“外交”仅仅系于美国一根绳子上。^[2]第二,台湾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将主要资源用于发展,尤其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经济竞争力,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与欧共体的贸易得到大幅度提升。1980 年,台湾出口到欧共体的金额已近 29 亿美元。因此,台湾在对欧盟的经济“外交”方面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和余地,^[3]台湾也因此获得欧盟及其会员国的重视。

随着欧盟国家纷纷与台湾“断交”,台湾对欧盟国家的“外交”模式也进行了调整,由原有的与欧盟国家间的“高阶政治”关系,逐渐改由贸易、文化等“低阶政治”关系所取代:台湾开始在欧盟国家建立“非官方机构”,以取代原有的“大使馆”,希望借“非正式外交”替代原有的正统方式并运用经贸力量换取政治优势。^[4]例如,1971 年台湾在比利时设立“孙中山文化中心”,1972 年在法国设立“法华贸易观光促进会”,1979 年在荷兰设立“远东商务办事处”等,都是执行这样的功能。但由于当时台湾的经济重要性对欧盟及会员国来说,仍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并没有强烈的诱因促使欧盟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依赖日益加深,这为台湾与欧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台湾经济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已取得惊人的成就,尤其对外贸易额大幅成长,经济实力快速增强,这引起了欧盟及其会员国的重视。台湾与欧盟主要国家,如英、法、德、荷等国的贸易关系都大幅增加,这推动了台湾与欧盟政治关系的发展,使欧盟一些国家原来被视为禁忌的“高阶政治”方面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如政治人物的互访和接触层次有所提升,一些欧盟国家公开对台军售,欧台实现通航等。

尤其在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非常重视对欧盟的“外交”,台湾与欧盟关系不断得到强化。李登辉、陈水扁多次强调与欧盟建立实质关系的重要性,要求“外交”部门积极扩大和提升与欧盟的关系,推动与欧盟的“全方位外交”。^[5]1990 年,台湾在比利时代表处设立“对欧体工作小组”(后更名为“对欧盟工作小组”)。台湾行政部门相关部会也于 1992 年 1 月成立“对欧联工作指导小组”(后更名为“对欧盟工作指导小组”),负责协调当局各部门对欧盟工作。^[6]2001 年 7 月,陈水扁当局决定,每年召开一次欧盟政策协调会,由“行政院秘书长”主持,提升政策协调位阶。^[7]目前台湾在欧盟及其 27 个成员国中设立了 29 个代表处。在台当局的大力游说下,2003 年 3 月,欧盟执委会正式在台设立“欧洲经贸办事处”。近年来,欧盟已经成为台湾在推行“务实外交”方面重视程度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地区,台湾明显强化了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外交”攻势。一方面提高驻欧盟人员等级,同时增加人员编制和活动经费;另一方面,台湾当局提出“政党外交”、“文化外交”、“城市外交”、“民主外交”以及“全民外交”等招数,通过各种手段与渠道增进与欧盟的关系,试图不断推动台湾与欧盟关系的实质性的进展。

即使在 2008 年马英九上台以后,台湾与欧盟的关系也有所提升。2009 年 5 月,欧盟经贸办事处在台北成立了“欧盟中心”,作为全面提升台湾和欧洲双边交流和了解的主要管道。2010 年 12 月,欧盟正式宣布台湾取得欧盟免签证待遇。近来,欧洲智库也发布报告,建议欧盟考虑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FTA)。这些现象表明,在冷战结束后的 20 年时间里,台湾与欧盟的关系日益密切,双方的实质关系有所发展。

二、台湾对欧盟“外交”的主要形式

1. 经贸“外交”

经贸关系在台湾与欧盟关系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冷战后，鉴于亚太地区经贸蓬勃发展和确保欧洲在亚洲地区经贸利益之考量，作为全球一个重要的力量中心，欧盟逐渐重视亚太地区，开始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台湾利用这一有利契机，以所谓更“务实弹性”的态度和做法，加速与欧盟国家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试图拓展、加强与欧盟关系。台湾还成立了相应机构，整合相关资源，致力于强化与欧盟经贸关系。

1989年7月，在台湾“经济部”的筹划下，台湾制定了“加强对欧经贸工作计划纲要”，提出顺应欧洲重视亚太经济发展之契机，强化台湾与欧盟双向投资、技术合作关系，加速促成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落实经济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增进对欧双边贸易及市场占有率；凝聚整体力量、提升台湾与欧洲国家之实质关系。为此，“经济部国贸局”于1992年成立“欧洲单一市场研究项目小组”，整合台湾各部门力量，研究欧共体的法律法规，在贸易、投资、科技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全面拓展与欧盟的关系。^[8]

在这种情况下，冷战后，台湾与欧盟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台湾与欧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截至2009年，台湾成为欧盟第19大贸易伙伴。根据台湾方面的数据显示，欧盟对台湾的直接投资占整体的25%，胜过美国与日本的对台投资。在2009年，欧盟对台湾投资的金额超过20亿美元，成为对台投资最大外贸来源，约占整体的43%。^[9]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台湾与欧盟政治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议会外交”

长期以来，台当局都把欧盟及其成员国视为“非邦交国”中继美、日之后的“重点工作对象”，尤其重视对欧盟及其会员国的“议会外交”。台“立法院”以“国会外交”为招牌，成立台波（波兰）、台德等“国会议员联谊会”，以配合李登辉、陈水扁的“务实外交”、“全方位外交”等。1994年，台“立法院”成立“中欧国会议员联谊会”（后更名为“中欧国会议员交流协会”），定期由会长率团访问议会，以推动对欧盟的议会交流。2000年5月，“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由“副院长”率团出访欧洲议会。2002年7月，“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访问欧洲议会，并顺访欧洲国家国会，以加强欧洲议会外交。台当局还大把砸钱，利用各种方式，拉拢、收买亲台议员。在台当局的“外交”攻势下，目前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多数都成立了亲台的“欧洲议会友台小组”，208位“欧洲议会友台小组”的成员遍布这27个国家。“欧洲议会友台小组”是一个以欧洲议会人民党团为基础的非官方组织，其在促进台湾与欧盟关系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如学者所言，它是“促使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推动力、台湾施展外交游说的重要平台、欧盟对台友好政策的催生者与台欧友好关系的基石”。^[10]

近年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些涉及台湾问题的议案（据统计，从1993年至2009年，“欧洲议会友台小组”共推动了14项“友台决议案”^[11]），其内容明显违反一个中国政策，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干扰。

3. 民主“外交”

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当局非常注重在对外关系中打“民主牌”，对欧盟的“外交”也是如此。台湾当局一方面宣称自己的价值观与欧盟相同，以争取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极力渲染欧盟和中國大陸在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如陈水扁在2007年7月在欧

洲议会播放他的录影谈话中表示“欧洲民众与台湾民众有对自由、民主、人权、和平和公义等普世价值的坚定信念”，“台海两岸关系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民主，如果中国无法走向民主，始终坚持一党专政、极权政治，则中国军事扩张与武力侵略的危险性也将日益升高。”^[12]台湾不断有人强调，台湾的“民主奇迹”、“人权立国”，是21世纪“人权外交”、“多元外交”的基础。并称，基于欧盟国家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重视，以及台湾过去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奠定的不错的国际形象，台湾应与欧洲议会加强联系，并积极游说欧洲议会友台力量，在对中国大陆全面解除武器禁运之前，制定以欧洲议会为主导的“台湾关系法”，在欧盟内部确立更明确的两岸和平与军事均衡的政策保障依据。^[13]

4. “非政府组织外交”

冷战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快速崛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迄今在全球已有43000余个非政府组织。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也在政治民主化后迅速发展。台湾当局在“外交”努力一再碰壁的情况下，除了继续追求“传统外交目标”外，转而重视“非传统领域”，加大对非政府组织投入，试图以迂回方式再辟“外交新天地”，达到拓展“国际空间”的目的。因此，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一跃而为台湾“全民外交”的重要一环。“非政府组织外交”不仅被台湾当局誉为“新外交”，而且被提升到“外交战略大创新”高度加以推行。^[14]近年来，台湾当局利用非政府组织，强化推动“公共外交”，扩大国际人道参与。台湾当局通过非政府组织发展与欧盟各国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合作交流，并透过学术、文化、联谊、急难救助、信息交换等多方位、多面向的渠道，加强非政府组织与民间交流层次的推展与宣传，借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民间协会，提供欧盟国家与人民认识台湾的机会，提升欧盟各国对台湾更高的认同与支持。台“经济部”的“国际经济安全合作发展基金”、“外交部”的“人道基金”，均是承担“民间外交”的主力军。^[15]台湾当局还规划，未来将结合医疗、人权、救灾、保育、环境、文教、艺术、科技、社区发展等非政府组织，持续推动“全方位外交”，增加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同。^[16]

此外，台当局除大幅增加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络绎不绝地派高层人士前往欧盟主要国家活动、游说，大量邀请这些国家政治人物访台等外，更处心积虑地针对不同对象国，分别寻找最可能的切入点，谋求在双边实质官方关系上有所突破。^[17]

以上四种形式是冷战后台湾当局对欧“外交”的总概括，实际上，在李登辉、陈水扁及目前执政的马英九等不同时期，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面对的环境以及个人理念的不同，他们推展“外交”的出发点、侧重及效果等也有一些不同。李登辉执政期间，一方面，遇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权力结构最大的变动，另一方面，台湾厚植了较强的经贸实力。基于此，台当局认为，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其拓展“外交”有利。所以，台当局采取“更实际、更灵活”的策略，积极拓展对外关系。在对欧“外交”方面，台当局主要侧重在对欧盟的“经贸外交”，大打“经贸牌”，试图以不断累积的经济实力为筹码，通过经贸关系的“外溢效应”推动对欧“实质关系”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台湾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有所升温，台湾与欧盟之间不仅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往来也日渐增多，甚至出现对台军售。但欧盟国家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由于台湾经济发展迟滞，台湾与欧盟贸易严重衰退，2001年至2003年间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贸易额更滑落到1995年水平。^[18]在这种情况下，台对欧盟“经贸外交”的能力有所下降，台将平和、民主的首次政党轮替作为资产，大力强化对欧盟的“民主外交”、“人权外交”，极力宣扬台湾所实践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希望以此获得欧盟的认可与支持。陈水扁当局尤其加大了对欧洲议会的“外交”攻势，欧洲议会“友台小组”势力有所增强，并相继通过多项涉台决议，不断为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等摇旗呐喊。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马英九摒弃了陈水扁当政时的“烽

火外交”，提出了“活路外交”及“外交休兵”等理念，尝试着不再与大陆在国际上进行“外交”争夺，避免不必要的内耗。更重要的是，与李、扁当政时不同，马英九不以损害两岸关系来推进台湾对外关系的发展，而是兼顾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的平衡。从这样的理念出发，马英九虽然也重视对欧盟的“外交”，但更多的是利用两岸关系改善的积极成果，在经贸、文化等方面强化台湾与欧盟关系的进展，如争取欧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争取欧商来台设总部等。

三、台湾与欧盟关系发展的原因及制约

在国际关系中，不同的国家及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往往会有不同的对外政策。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受到不同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影响。^[19]冷战后，台湾与欧盟关系的强化，是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利益的驱动、意识形态的趋同以及台湾“外交”攻势的强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国际环境的变化

台湾与欧盟关系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不稳定，70年代之疏离，到八九十年代后的不断发展与加强，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二次大战后最深刻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彻底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本质，开启了后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就军事能力而言，虽然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但就经济实力及潜力来说，欧盟、日本、中国发展成为新的力量中心，并且在国际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冷战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在国际舞台起重要作用的新的角色。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的危险基本消除，世界各国的注意力普遍转向发展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之间互相依赖程度加深。“国际角色的增加及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改变冷战时期国际交往与互动模式，也提升了台湾与欧盟的关系。”^[20]

2. 经济利益的驱动

各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实现与维护国家利益，^[21]国家利益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概念和因素。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重心由过去以军事政治对抗为主，转向以科技经济竞争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由于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上升到首要位置，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淡化，各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向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最大化地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冷战后的这种“外交”经济化在台湾欧盟关系的发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从欧盟的情况看，冷战后，欧盟整合速度加快，全球影响力扩大。对于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欧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欧盟与亚洲间的贸易也快速成长。欧盟国家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特别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及发展，而台湾的经济力量、发展经验及对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地位，尤其引起了欧盟的重视。从台湾的情况看，李登辉上台后，放弃了“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大力推动“务实外交”，以经贸和功能主义，不断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在“功能主义”的基本策略下，未有官方“外交”之前，先以功能性议题，如经贸文化交流和航权签署，再试图渐进提升到官方的“外交”层次。^[22]利用既存的经贸优势发展与欧盟的实质性“外交”关系，是台湾对欧“外交”的重点。“贸易，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可以在关键时刻，将经济关系转变为政治力量。”^[23]以经贸为主轴，将在“低位阶议题”经贸领域取得的“外交”绩效转化为以政治资源为核心，以争取欧洲国家承认台湾的“政治实体”地位为目标，从而与欧盟建立有别于正式“外交”关系的、无其名有其实的“功能外交关系”，是台湾发展与欧盟“外交”关系的基本方略。

3. 台湾与欧盟在民主化等价值观上的趋同

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始政治转型,走向民主化。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较为平顺,为民主改革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较低,政治秩序从未出现中断的情况,政局震荡对于社会与经济冲击十分有限。^[24]在欧盟看来,“台湾民主实践符合‘参与民主’的共同标准:直接选出政策形成的政府官员、经常性及公平选举、成年公民普遍投票权、无歧视性言论自由、多元资讯及地方自治。”^[25]这些都符合欧盟的社会及文化价值,获得欧盟的认同。欧盟执委会对外事务代表彭定康于2003年1月23日接受“欧洲之声”专访时指出台湾在政治转型的民主化过程,以及繁荣经济的成就,都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象。^[26]2003年3月,瑞典、丹麦及挪威三国举行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赞扬台湾是东亚最活跃的民主政体之一,而且是华人地区第一个民主“国家”。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当台湾经济不断茁壮,政治民主化后,民主国家无论从利益或意识形态,都比较乐意亲近台湾。也就是说,台湾民主化有助于改变其形象,有利于拓展实质关系。^[27]一位欧盟官员就表示,台湾民主化是强化台湾与欧盟关系的主要因素。^[28]尤其随着欧洲议会的权力不断扩大,台湾民主化的因素在提升欧盟与台湾的关系上起着更大的作用。

4. 台湾对欧盟“外交攻势”的加强

冷战后,面对国际格局中多个力量中心的发展,台湾在“外交”中开始摆脱过去“重美日轻欧洲”的“单边关系”的倾向,开始重视与各国的“多边关系”,采取“美欧并重”的策略,重视对欧盟的“外交”。尤其随着欧盟统合的加强,台湾的一些“智库”建议把欧盟列为台湾“外交”的“一级战区”,集结产、经、学界人力,强化对欧盟的“外交”。其中,欧盟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是台湾当局游说拉拢的重点。尤其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当局不断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谋求欧洲国家对“台独”的“同情”与支援。台当局并设置“台湾民主基金会”,促进“政府”与民间部门参与政府间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及相关活动,不断加强与欧盟的对话,在社会、文化、科技、环保和教育等议题上开展全面合作,推动台湾与欧盟关系的实质性进展。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尽管台湾当局不断强化对欧盟“外交”,但无法改变和动摇欧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尤其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日益重要,在大陆、台湾、欧盟三边关系中,大陆与欧盟关系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台湾与欧盟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大陆对欧盟的巨大利益也是台湾对欧盟的利益所无法相比的。自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欧联系日益紧密。目前,双方已建立30多个磋商与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贸、科技、能源、环境等领域。中欧建交以来,双方的经贸合作稳步上升。据统计,2010年前11个月,中欧双边贸易为4399亿美元,同比增长33.1%,增速高于同期中美和中日贸易额。目前,欧盟累计在华投资已超过700亿美元,跃居中国大陆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欧盟连续多年保持中国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大陆则连续多年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于2009年超过俄罗斯跃居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29]

与其他大国关系相比,中欧之间地理上相距遥远,没有地缘利益的直接冲突。整体而言,欧盟的对台政策从属和服从于对华政策之下。一方面,与美国相比,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利益并不明显,更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地缘利益。另一方面,欧盟发展对台关系,主要着眼于经贸利益的考量和对台湾民主化发展的某种认同。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与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从总的趋势上看,与大陆相比,台湾对欧盟的重要性会趋于弱化。尽管台当局重视与加强对欧“外交”,但欧盟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架构,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发展对台关系,而且,台湾与欧盟关系只能在非官方架构下发展。随着中国大陆对欧盟重要性的大幅提升以及中欧共同利益的日益增加,欧盟会越来越顾及中国大陆的反应,小心谨慎地处理对台实质关系。

注释:

- [1] [4] [20] 王万里《台湾与欧盟》,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2 年,第 35 页,第 43 页,第 75 页。
- [2] 参见郭建平《冷战后美日欧盟与台湾关系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 年,第 417 页。
- [3] 程又中《中国—欧盟合作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第 236 页。
- [5] 参见 <http://www.huaxia.com/xw/tw/00216187.html>
- [6] 台“外交部”“外交”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91 年“外交”年鉴》,台北:正中书局 2003 年,第 190 页。
- [7] 黄嘉树、林红《两岸“外交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182 页。
- [8] [15] 杨丹伟、徐国立《欧盟:台湾“外交”的新方向》,参见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6249>
- [9] 参见欧洲经贸办事处网站 http://ec.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eu_taiwan/trade_relation/index_zt.htm
- [10] [11] 参见张福昌《台欧关系的基石——“欧洲议会友台小组”的建构与功能》,台湾《东吴政治学报》2009 年第 27 卷第四期,第 56 页,第 70 页。
- [12] 《陈水扁欧洲议会录影谈话 强调台湾坚持民主》,《星岛网讯》2007 年 7 月 11 日。
- [13] 《欧盟的台海两岸政策报告》,中华欧亚基金会 2004 年 10 月。
- [14] 孙茹《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外交”》,《国际资料信息》2007 年第 6 期。
- [16] 参见台湾《2006 年“国家”安全报告》。
- [17] 参见《2002 年台湾对外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6-04/03/content_4378375_4.htm
- [18] 王万里《欧盟、台湾、中国三边关系剖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8 年,第 246 页。
- [19] 参见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218—219 页。
- [21] 周敏凯《国际政治学新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29 页。
- [22] 戴宝村《台湾政治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6 年,第 389 页。
- [23] 林碧昭《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年,第 263 页。
- [24] 朱云汉《公元 2000 年总统大选对台湾民主巩固的意义》,参见 <http://www.1911.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480>
- [25] [28] 转引自王万里《欧盟、台湾、中国三边关系剖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8 年,第 122 页,第 124 页。
- [26] 参见台湾“外交部”前“政务次长”高英茂于 2003 年 5 月 29 日在台“立法院”所作的“2003 年我推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案检讨报告”,见台“外交部”网站。
- [27] 高朗《“中华民国”“外交”关系之演变(1972—1992)》,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 年,第 36 页。
- [29] 参见《携手互利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高虎城谈中国与欧盟经贸合作》,《人民日报》2010 年 12 月 29 日。

(责任编辑:李 鹏)

The “Diplomacy” between Taiwan and EU after the Cold War

Sun Yun

Abstract: A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of EU has been extending after the Cold War, the Taiwan authorities regarded EU as one of their key diplomatic targets and paid much attention to it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EU. They have been taking various ways to promote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with EU.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ests and democratization identity, EU also tends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und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eparation policy. This essay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basic trajectory of Taiwan – EU “diplomacy” after Cold War, and analysi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ir relationship.

Key Words: Taiwan – EU relationship, diplomacy